



【中东研究】

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王新刚

(西北大学 应用社会科学系,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历程中, 殖民主义政治影响、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军人干预政治、复兴党理论与实践, 以及阿萨德个人权威及其政治合法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因素或前后相继、或相互作用, 主导了现代叙利亚政治发展方向, 并最终确立起复兴党一党执政党政合一的总统共和制体制。

关键词: 叙利亚; 现代政治;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K3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09)06-0153-05

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历程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自此之后, 现代叙利亚政治经历了委任统治、议会民主和复兴党一党执政等三大历史时期。综观三大历史时期, 殖民主义政治影响、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军人干政、复兴党理论与实践, 以及阿萨德(al-Aсад)个人权威及其政治合法性, 主导了现代叙利亚政治的发展方向, 并最终确立起复兴党一党执政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

一、现代叙利亚政治发展进程中的 殖民主义因素

国际上有学者认为, 叙利亚国家政治制度是殖民地衍生型国家^[1]。从历史的角度看, 这一判断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虽然在一次大战末期及其之后, 叙利亚民族主义者曾尝试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 但这一尝试被殖民主义委任统治所击碎。殖民主义委任制度建立之后, 经过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反复斗争, 迫使法国殖民者假借民族自治之名, 同意召开立宪会议, 起草宪法。1930年5月, 以民族联盟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政党, 在得到将通过签订法叙条约以取代委任统治的承诺后, 接受了这部宪法, 并建立起一院制议会和自治政府。1939年至1943年, 法

国委任统治者中止了该宪法, 但1943年恢复后, 在叙利亚自治政府倡议下, 议会通过了取消该宪法中委任统治条款的议案, 叙利亚国家在宪法意义上实现了独立, 而这部宪法至1950年宪法制定之前, 成为叙利亚民族独立国家的根本大法。1950年制定独立后第一部宪法又以这部宪法为蓝本, 进而使脱胎于殖民主义时期的一院制议会民主制政体得以延续。1964年复兴党执政后制定1964年宪法之前, 叙利亚国民议会以及军人独裁政府曾几度修改或制定新宪法, 但1950年宪法的基本宗旨仍保留下来, 即继续维护和推行议会民主制。当这一议会民主制与共和制政体相结合, 便构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叙利亚国家政治制度。虽然期间经历了希沙克里(shishak li)的军人独裁统治时期(1951年至1954年)和叙埃合并的特殊时期, 但议会民主共和制政治制度在艰难与曲折中延续着, 直至复兴党执政后, 这一政治制度才最终被抛弃。上述事实说明: 殖民主义者强行植入的以1930年宪法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及其之下的叙利亚政治发展, 深受殖民主义的影响。

1930年宪法是殖民主义的政治产物, 带有浓烈的殖民主义色彩。但是, 它把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和现代共和制政体植入到一个民族资

收稿日期: 2009-06-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D8BSS017)

作者简介: 王新刚, 男, 青海乐都人, 西北大学教授, 从事中东问题及国际政治研究。

产阶级尚不成熟、资本主义经济尚处于萌芽状态、一个有着强烈的专制主义传统和长期的政教合一政治宗教背景的社会中,其积极性和进步意义还是明显的。特别是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看,它不仅是叙利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初始阶段,标志着叙利亚现代政治的萌生,而且对此后叙利亚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殖民主义因素还从相反的方向促使 1930 年宪法基础上确立的政治制度得以维系。殖民主义统治,促使阿拉伯地区以及叙利亚地区反殖民化的民族主义力量不断发展。在叙利亚民族主义运动中有两股不断壮大的力量。一股是以民族联盟为代表的大地主及其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传统的民族主义力量。他们在反对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方面,态度和立场是坚决的,但在斗争的方式上,由于阶级性质所致,又采取温和的方式,希望通过与法国当局谈判,以叙法条约取代委任统治。为此不惜妥协、退让换取独立地位,因而他们接受了 1930 年宪法。另一股力量是激进的共产党以及在 30 年代中期兴起的阿拉伯复兴运动等新兴的民族主义力量。由于一系列错误主张,在 40 年代,叙共的影响力削弱。而阿拉伯复兴运动则不断发展,并强烈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号召对殖民者进行“国民圣战”。但阿拉伯复兴运动及其在该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独立之初直到 1963 年复兴党少壮派登台执政前,一直主张走议会道路,提倡和拥护代议的和立宪制政体。这两股影响强大的力量前后相继,不仅使 1930 年宪法得以保留,而且在制定 1950 年宪法过程中及其之后,都使得 1930 年宪法的基本宗旨得以延续。

二、民族主义力量的政治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摆脱了奥斯曼帝国数百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当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希望破灭之后,又遭遇了 20 余年的殖民主义统治。然而,叙利亚国家毕竟开始了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在此之前,叙利亚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十分强烈、有着长期政教合一政治宗教背景的国度。在这样一个国度中,经济特别是现代经济的发展仅仅处于萌芽阶段,教育与文化等事业,除极少数西方传教团兴办的新式学校和一些具有现代新思想的本地知识分子开办的极少数报刊及出版业以外,在整体上几乎仍处于中世纪的水平。在这样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下,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阶层

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但是由于殖民主义在 19 世纪的大规模侵略以及殖民主义入侵造成的民族危机和封建制度危机,促进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觉醒”。“中东觉醒”时期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新思潮在叙利亚沦为法国委任统治地之后仍然有着强烈的影响。在委任统治建立之后,当新的器物文明的影响不断加深时,叙利亚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大地主阶级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便开始形成一股股新的政治力量,进而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例如,由大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民族联盟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团体。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在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并带有浓厚的封建家族及部族色彩,这就决定了他们带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在 30 年代政治协商时期,执行温和的和妥协的路线以换取独立地位的努力,终于以失败告终。但是在委任统治中期和末期,民族主义党派在自治的名义下,依据 1930 年宪法建立起具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一院制议会和共和制政体,名义上也拥有本国的共和国国家元首和内阁总理等一整套官僚体系,也取得了一定的执政经验。在这一时期,叙利亚国家与社会也开始了从传统封建专制制度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叙利亚民族主义力量在政治上是较为成熟的。然而,叙利亚民族主义力量在政治上的成熟是具有超前性的,是与经济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在委任统治结束后,已经处于执政地位的民族主义政党,如民族联盟等,作为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当然希望既定的政治制度继续延续。在这一点上,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共和制或议会制国家有所不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大多是在民族民主运动中驱逐殖民统治或推翻君主制之后,才逐步建立起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国家政体和政治制度,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借鉴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或东方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反,叙利亚独立之前就已经拥有一套虽说并不完备,但却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和共和制政体。因此,从政治制度的层面上看,不仅叙利亚民族主义运动及党派在政治上的成熟具有超前性,而且同时叙利亚的政治制度也具有超前性。当委任统治结束之后,这两个超前性便与具有浓烈传统封建色彩的、经济基础不发达的现实社会发生碰撞。

1947 年叙利亚获得完全独立后,民族爱国联盟(即前民族联盟)很快发生分裂。1947 年议会选举前,民族爱国联盟分裂为阿塔西(A t a s i)家族为首的、

代表北方主要部族的、以霍姆斯和阿勒颇等中心城市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为骨干的人民党和以库阿特里为首的、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以中南部地区家族、部族利益集团为骨干力量的国民党。即使像阿克拉姆·胡拉尼 (Akram Hourani) 等具有现代新思想新知识的后起的政治人物也是以家乡哈马地区为基地, 强调和维护地方的和以家族为背景的政治经济利益。复兴党少壮派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崛起, 也是以阿拉维派和德鲁兹等少数宗教派别为背景, 甚至以家族、部族血缘血统为纽带, 角逐于政治舞台。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决定了具有超前性的西方政治制度在叙利亚不具备深入发展和完善的基础。当具有现代知识和组织纪律较强的军人集团崛起后, 在国内外各方面因素促使下不断发动军事政变时, 就导致既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开始发生动摇, 并一次次发生逆转。传统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党派如民族爱国联盟以及分裂后的人民党和国民党等不仅无力挽回危局, 也无力维护既定的政治制度, 进而使暴露出难以克服的弱点和脆弱性。1963 年“三·八”革命前的历次军事政变后, 议会民主制勉强得以恢复, 但一次次冲击, 促使议会民主制名存实亡, 同时, 也使国家和社会一次次陷入动荡。当经济发展及社会等也因此受到冲击时, 广大民众便开始厌恶既定的政治制度, 厌恶军人干政和党派纷争, 致使既定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失去社会基础。与此同时, 以穆斯林兄弟会为首的宗教保守势力和以复兴党少壮派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力量趁势崛起, 最终促使议会民主制走向衰亡。

三、军人干预政治的影响

叙利亚军人干政是国家政治发展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军人干政不仅是叙利亚既定的政治制度一次次发生逆转, 并最终走向衰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也是推动政治制度从议会民主制向复兴党一党执政政治制度转换的重要力量。

军人干政, 军事政变层出不穷, 并导致政权频繁更迭是中东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 叙利亚的军事政变无论是其烈度还是频度都堪称中东之最。仅 1949 年一年就发生了三次成功的政变。截止 1970 年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 叙利亚共发生了九次成功政变。这些政变彻底改写了叙利亚独立以后的政治发展历程^[2]。

叙利亚政变频繁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首先是叙利亚国家与社会长期处于经济发展的落后状态。独立前, 叙利亚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 几乎没有现代工

业, 社会经济生活以家族、部族, 甚至氏族为主体。除去中心城市之外, 在广大农村及偏远地区仍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这种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为军人崛起、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土壤。其次, 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叙利亚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 而转型时期正是剧烈动荡的社会发展时期。独立初期, 叙利亚尽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宪法体系, 但司法等制度尚不健全。即便是已经建立的司法制度也往往被任意践踏, 如希沙克里独裁时期就撤销了国家最高法院。再次, 以家族、族群为背景的政党及军中不同集团之间的派系争夺加剧, 各派势力之间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以及争夺更多的利益而展开更加激烈的争夺, 特别是军队中存在着亲英派、亲美派以及亲伊 (拉克) 派等。这些派系在争夺利益时, 在受到外部因素刺激以及个人野心和权欲膨胀时, 便铤而走险夺取国家权力。第四, 叙利亚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如民族爱国联盟, 虽然在民族独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独立后发生分裂, 力量削弱。新兴政治力量如阿拉伯复兴党及合并前的阿拉伯社会党等, 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期前没有成熟到主导叙利亚政治生活的程度。50 年代中期后其力量虽然明显上升, 但在“阿联”期间遭受严重挫折。60 年代初, 复兴党也发生分裂。60 年代中期前, 只有军队是有严格组织纪律、接受并掌握现代新知识, 其部分领导人又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有组织的力量。

从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看, 不同时期其诱因各有不同。以 1961 年 9 月 28 日政变为界线, 此前政变, 直接诱因多来自外部。例如, 1949 年三次政变的直接原因是美英在幕后的策划和操纵。1951 年及 1954 年政变也有国际背景。这五次政变, 对现行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产生了强烈冲击, 致使国家与社会陷入动荡之中。1956 年初, 美英通过伊拉克在叙利亚再次策动政变, 但未成功。1961 年 9 月 28 日政变更是叙利亚军人不满纳赛尔 (Nasser) 的极权统治而诱发的。上述一系列政变中, 1954 年政变和 1961 年政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如 1954 年政变推翻了希沙克里的独裁军政府, 1961 年政变使民族独立主权国家地位得以恢复。除此之外, 其他政变都对国家政治生活, 特别是对既定的政治制度造成了严重伤害。叙利亚军队与其他中东国家军队不同, 其他中东国家的军队是在民族民主运动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掌握政权后, 大多在推进各自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如亨廷顿 (Huntington)

ton)所说:“军人干预明显地是政治现代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3]。但这一时期叙利亚军人干政主要是破坏性的,他们通过政变不断地干预政治,促使叙利亚议会民主制不断走向衰亡。1962年3月28日至4月3日,一周之内发生三次未遂政变,这三次未遂政变进一步加速了议会民主制的衰亡。

1963年“三·八”革命后,叙利亚军人干政和军事政变原因和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三·八”革命(又称白色革命,即不流血政变)及其之后的军事政变主要是国内因素所致,即国家与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以及复兴党党内的派系之争。“三·八”革命与以往政变最大的不同,是它开启了复兴党一党执政的帷幕。在复兴党领导下,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成为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最高领导机构,国家政治制度向着党政合一、一党执政的方向迈进。1966年“二·二三”政变及同年9月的复兴党“民族九大”之后,复兴党元老派阿弗拉克(Aflaq)和比塔尔(Bitar)以及中间派哈菲兹(Hafiz)等人被逐出党和政府,全国革命委员会完全由复兴党地区领导机构成员贾迪德(Jadid)、阿萨德等原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少壮派军人所把持。复兴党党政合一、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向前发展。1970年11月“纠正运动”后,在阿萨德的主导下,修改宪法,改总理内阁制为总统制,但坚持共和制政体;1971年建立人民议会,重新确立宪政体制;1972年建立全国进步阵线并彻底改组复兴党民族和地区领导机构;1973年制定永久宪法,并在宪法中确定复兴党为“国家的领导党”。至此,复兴党一党执政党政合一总统共和制国家政体最终建立起来,从而完成了“三·八”革命以来政治制度的转换。

四、复兴党及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的因素

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及其理论与实践在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历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对当代叙利亚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个公认的具有完整思想理论体系的现代民族主义政党,它对叙利亚现代政治历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及其理论思想体系的创始人人们提倡和拥护议会民主制,主张代议的和立宪制政体,因而伴随着复兴党的发展与壮大,对50年代叙利亚既定的政治制度起到了维护与推进作用。即使在1963年“三·八”革命之后,阿弗拉克(Michel Aflaq)等人仍坚持走议会道路。

(二)1963年后,复兴党及其思想理论迅速“左”倾化。其标志是1963年10月复兴党“民族六大”。“民族六大”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要“加强社会主义改造”。当阿弗拉克等人在党内逐渐失势,并最终被驱逐出党后,上述“左”倾化进一步加强。在初步构筑起一党执政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的同时,复兴党政权进一步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运动又开展起来,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在彻底瓦解了原民族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初步建立起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有计划的经济体制。

(三)在阿萨德的领导下,复兴党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重构国家政治制度,并从宪法上予以确认。1973年宪法作为永久宪法至今仍然是叙利亚国家的根本大法。复兴党重构国家政治体制的同时,也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确定了发展方向。例如1973年宪法就再次确认了“国有经济主导下的有计划的经济体制”。但复兴党也注意调整贾迪德时期的过激做法,采取务实政策,适度鼓励对外开放,放宽对私营经济的限制。此后,私营经济不断发展,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了辅助作用。80年代初,政府允许公私合营企业存在。80年代末,在适当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开始强调私营经济的作用,并鼓励私人企业及外国投资者在叙利亚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1991年5月“10号”投资法的公布,标志叙利亚的经济进一步开放。

(四)坚持世俗化政策,妥善处理宗教及教派矛盾。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历来主张伊斯兰教、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原则。阿萨德时期更是继续谨慎处理宗教与政治关系,将宗教活动乃至宗教势力纳入国家的控制之下,并使宗教活动逐步远离国家政治生活,为复兴党的世俗化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4]。

五、阿萨德个人权威及其合法性

20世纪70年代初,在阿萨德的领导下,复兴党重构了国家政治制度。在新的政治制度下,阿萨德集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以及全国进步阵线主席于一身,阿萨德个人的政治权威不断上升。而相对阿萨德个人权威的上升,复兴党及其人民议会、全国进步阵线乃至政府部门的政治作用和地位下降。其原因是:第一,阿萨德本人具有极强的政治领导才干。阿萨德是叙利亚现代史上公认的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他在剧烈的政治

动荡时代中脱颖而出,使国家与社会实现了稳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在对外关系中,使叙利亚逐步成为在中东事务中有较大发言权的政治、外交大国。因此,叙利亚广大民众敬仰他的个人才干,阿萨德的威望在国内不断上升。第二,国家的政治体制确保了阿萨德本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论是宪法,还是复兴党党纲以及全国进步阵线章程都从国家的政治层面上奠定了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地位,使他在政治上具有完全的合法性。第三,阿萨德在党、政、军各个部门任用亲信,并以阿拉维派等宗教少数派人士为主体,建立起以他为核心的具有家族色彩的权力中心。由于这一状况,国际上甚至叙利亚国内有人认为,叙利亚国家政权是阿拉维派等少数派专制政权。然而,少数派专权仅仅是一个表象,更重要的是,在上述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阿萨德个人权威已上升为国家最高权威的代表,并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国际上有舆论常常把叙利亚称作“阿萨德的叙利亚”。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从叙利亚政治发展历程看,独立后至1963年“三·八”革命以前,国家权威政治合法性基础无疑是传统的。尽管其议会民主制是现代的、共和制政体也是现代的(由殖民主义植入的),但长期执政的叙利亚大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带有浓重的部族、家族和教派等封建色彩,因而从本质上讲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传统的,而非现代的。1963年“三·八”革命以来,当这一传统的合法性被否定后,在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时,阿萨德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横空出世,并逐渐建立起个人权威。当这种权威超越国家权威时,阿萨德个人政治权威就演变成国家最高权威的代表。

以阿萨德为代表的最高国家权威,实现了国家力量的增长,不仅使国家结束了长期动荡的局面,而且使国家和社会在稳定的环境中不断向前发展——保持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稳定与进步,更

重要的是促使国家与社会向着现代化迈进。尽管阿萨德政权还带有教派、家族等色彩,但是以阿萨德为核心的权力中心毕竟实现了国家的整合和民族进步^[5]。更何况,叙利亚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于本国的历史文化宗教等传统之外。

六、结 语

上述五大因素或前后相继、或相互作用,主导了现代叙利亚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首先,殖民主义在民族主义力量的配合下,揭开了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进程的帷幕,并框定了此后叙利亚世俗的现代议会民主共和制的政治体制;其次,传统的民族主义力量政治成熟的超前性和政治体制的超前性与转型中的经济、社会基础之间的相斥性大于相融性,因此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剧烈的动荡与不安;第三,军人干预政治对现代叙利亚政治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并表现出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作用与影响。1963年前的军人干政,整体上不具有推动政治乃至社会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三·八”革命后,军人干政与复兴党政治思想及理论相结合,为复兴党一党执政准备了条件;第四,阿萨德领袖权威和政治合法性,是叙利亚国家重构政治体制,并稳固加强以及确保国家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 [1] SALAME, GHASSA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rab State [M]. London: Croom Helm, 1987: 22
- [2] 王京烈.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48-53
- [3]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175
- [4] 王新刚. 20世纪叙利亚——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嬗变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3: 166
- [5] 彭树智. 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 [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03: 249. [责任编辑 刘 欢]

A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od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Syria

WANG Xir-gang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litical history of Syria,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colonialism, the political forces of nationalism,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politic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Baath Party, the person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al-Assad play a crucial role. Before and after another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above-mentioned factors led the direction of the modern Syr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ed the presidential republic system with Baath party one-party ruling and integrating party and government.

Key words Syria; modern politics; influencing factors